

ZONGTONGKUAIXU
DI XIA DOU ZHENG JI SHI

王洪钧 著

“总统快步”
“统
领”



军事谊文出版社



“总统快婿”

——地下斗争纪实

王洪钧 编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新出图〔1997〕43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统快婿：地下斗争纪实 / 王洪钧编著. -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6

ISBN 7-80027-959-6

I. 总… II. 王…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1288 号

书名：“总统快婿”——地下斗争纪实

著 者：王洪钧 编著

出版发行者：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天利华印装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199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10.35

字 数：260 千字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7-80027-959-6/I·225

定 价：16.0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争经历了漫长的战斗历程。在这坎坷不平的征途上，留下了我党我军情报战士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新中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其中也有我党我军情报战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

为了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优秀的情报战士在隐蔽战线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灵活地利用敌人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获取机密情报，策反瓦解敌军，为夺取革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龙潭虎穴，他们忍辱负重，赤胆忠心，埋头苦干；在十里洋场，他们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处污泥而不染；在监狱牢房，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也有刀光剑影的战斗，许多优秀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辉煌业绩、高风亮节、英雄气概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即使取得了丰功伟绩也不会受到公开的表彰和宣传。他们的名字和功勋鲜为人知。相反，他们的身份有时却会遭人误解。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俏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纱幔在缓缓拉开，人们渐渐认识了许多当年在隐蔽战线上殊死搏杀的情报战士的英雄本色。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军事百科全书编撰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大量积累史料和采访老同志的基础上，写成《“总统快婿”——地下斗争纪实》一书，奉献给军内外广大读者，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书中真实生动地描述了情报战士对敌斗争中惊心

动魄的神奇事迹,热情讴歌了他们过人的胆略、超常的智谋和高尚的情操,读来妙趣盎然,感人至深,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在大力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认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本书中老一代情报战线的英雄们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目 录

总统快婿

——“神秘老人”陆久之 (1)

孤胆英雄

——韩练成与莱芜战役 (34)

“鬼才”厅长

——郭汝瑰在解放战争中 (89)

红色牧师

——董健吾在 30 年代 (133)

贾汪惊雷

——何基沣、张克侠与贾汪起义 (162)

山城红梅

——张露萍与军统电台的中共“特别支部” (206)

“少帅”上宾

——刘鼎与“西安事变” (246)

特殊“棋子”

——刘宗宽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285)

总统快婿

——“神秘老人”陆久之

久之同志，你为党立了新功，党感谢你！你因公致残，党是不会忘记你的功绩的！

——吴克坚

1966年春夏之交，一场空前的怪异的“红色风暴”从天而降。它遮天蔽日，迅猛异常，很快便席卷了大江南北。当人们还未来得及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整个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便全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

一天早晨，上海市淮海路一户人家的门外突然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张上面画了一条狗，大标题是：打倒蒋介石的狗驸马陆久之！蒋介石和陆久之的名字上都被用朱笔打上醒目的“×”。这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蒋介石的女婿在上海！附近居民和过路的行人都被这张大字报所吸引，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有的伸长了脖子，有的跷着脚尖，有的低头猫腰硬往人缝中钻。尽管人们看后表情不一，却都久久不愿离去，挤在一块议论纷纷，互相打听。有人说：“没听说蒋介石有女儿啊，哪来的女婿？”有人问：“陆久之是干啥的？他既是老蒋的女婿，怎么没跟老蒋跑到台湾去？”

此后不久，“蒋介石的狗驸马”在革命群众面前“现了原形”。他，陆久之，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一个中等身材、面目清瘦、头发花

白的老人。造反派给他戴上“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挂上“狗特务”的大牌子；一次又一次地在大街上进行游斗批判。期间，他们家被抄了 30 多次，老婆孩子东躲西藏，最后终于被扫地出门，赶到淡水路一所破旧不堪的房子里接受“监督改造”。造反派勒令他：每天必须到街道办的窑场里扫垃圾、搬砖头、做杂务。居民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说：“哟，真看不出他就是蒋介石的女婿！”有的人“警惕”性高，说：“此人隐藏得很深，值得注意！”有的人则附和说：“是啊，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女婿，他这特务工作可真是做到家了。”……

陆久之真是一个“神秘的老人”。

他真是蒋介石的女婿吗？有人说 是，有人说 非，但此事并非子虚乌有。因为蒋介石在和宋美龄结婚之前，不但在奉化老家有原配毛氏夫人，在苏州有一位姚怡琴夫人，在上海还有一位陈洁如夫人。陈洁如和蒋介石共同生活了 7 年，他们婚后领养了一个女儿，叫蒋瑶光，后改从母姓陈。这个陈瑶光，就是陆久之的夫人。因此，说陆久之是蒋介石的女婿并非无中生有。但陆久之却向人们断然声明：“我不是蒋家王朝的皇亲国戚。我和陈瑶光的结合，是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事，而她的母亲陈洁如早在 1926 年就被蒋介石遗弃了……”

陆久之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呢？有人说 是，有人说 非，此事也算“事出有因”。因为解放前他曾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同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汤恩伯称兄道弟，过从甚密，因此在 1955 年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中，他曾以反革命罪被判刑 15 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却至死不移，从不动摇。1983 年， he 去香港探亲，妻子儿女劝他定居香港，共享天伦；台湾友人劝他移居台湾，安度晚年， he 都坚决谢绝，声言：“要我背判自己的理想，这是决不可能的事！” he 只身一人返回上海，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大业贡献余热……

地下尖兵

1925年暮春的一天上午，坐落在上海有恒路1号的一家铺面不大的公司开张大吉。9时左右，一阵震耳的鞭炮声骤然响起，引得不少过往行人驻足观看。公司门口崭新的招牌上赫然写着：绍敦电机公司。与老板熟识的人们，三三两两走上前去致贺，年轻老成的老板和他英俊潇洒的助手客客气气地奉茶，请朋友们多多关照。

公司业务范围很窄，只是修理马达、家用电器、安装各种电灯。公司的人员也很少，只有一个老板，一个助手，外加一个负责烧饭、打杂的工人。老板30岁不到，助手20出头，都长得眉清目秀，清瘦白净，温文尔雅，看上去满身书生气，根本不像买卖人。

是的，这是两位真正的“世家子弟”。就是这两个文文静静的年青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尖兵。

老板姓蔡，名叔厚，又名绍敦，浙江诸暨人，其父在清朝末年曾任湖南华容知县。9岁那年，父亲死在任上，由母亲带回故里诸暨乡下。一个女人带了3个孩子，又不熟悉乡间情况，受同族亲友剥削欺凌，还要负担3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只能依靠典当、借贷度日，一家人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蔡叔厚在杭州模范小学毕业后，背着母亲，考进了学膳费很低的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母亲只好以借贷和变卖东西来支付他的学费，勉强让他读完了工业学校。1918年，他从甲种工业学校电机科毕业，被介绍到上海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棉纱厂做电机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受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他和几位同学自动离开日商办的纱厂，经“纱厂联合会”介绍，进了刘伯生办的宝成纱厂。进厂后，他修复了弃置多年的发电机，解决了电机及其线路的各种问题，深受厂方重视，被视为工程师。

老板的助手叫陆久之，190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僚家庭，其父陆翰，清朝末年曾任湖南辰州府台，后来当过浙江督军卢

永祥的亲信幕僚。在军阀孙传芳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被委任为军法处处长。陆久之是他的长子，自幼受父母宠爱。入中学后，他结交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跟他们在一起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立志振兴中华。陆久之常把一些进步书刊带回家里。他知道父亲有一个习惯：一坐到马桶上，就要随手拿一本书报翻看。于是，这位大少爷就把带回的《新青年》等刊物，预先放到马桶边。天长日久，他的父亲也受到了影响，因而对陆久之的自由思想，没有过多地加以限制和干涉。

辛亥革命后，陆久之父亲被罢了官，有一个时期回到常州老家赋闲。家中人口多，开销太大，作为长子的陆久之只好停学，考入上海宝成纱厂当练习生，那年他18岁。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介绍他参加中共地下党、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蔡叔厚。当时，陆久之已升到厂长办公室当职员，而蔡叔厚经常有事找厂长，因而他们常有接触。

由于家境相同，彼此文化水平也接近，在工作之余，又都喜欢舞文弄墨，谈古论今，赋诗对句，所以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蔡叔厚年长六七岁，总像大哥哥一样照顾陆久之，两人成为生死之交。

1924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百业萧条，发生排华事件，正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官费留学的蔡叔厚只身逃回上海，与陆久之商量，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不久，他从亲友处募集了一点资本，因陋就简地创办了绍敦电机公司。陆久之便成了他唯一的助手……

陆久之和蔡叔厚白天忙于业务，晚上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初步了解到中国受军阀割据的毒害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这时，“五卅”运动爆发，“北伐”战争也开始了，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他们认识到必须从技术救国的死胡同里钻出来，不能对眼前的革命斗争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于是，陆久之利用晚上时间，进入上海大学读书。

绍敦电机公司与地下党设在陕北路的上海大学近在咫尺，

陆久之在这里受到了恽代英、瞿秋白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教导，激起了对革命的向往和热情。在学习期间，陆久之接触了大批进步老师和同学，他们常到绍敦公司“串门”。蔡叔厚也有一批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和杭州工业学校学习时思想进步的同学，经常来找他。有恒路1号的绍敦电机公司就变成了革命者聚会的地点。叶剑英、李维汉、匡亚明、廖承志、冯雪峰、潘梓年等经常在这里碰头约会。陆久之和蔡叔厚两人私下谈笑时说：“我们这里可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不过，‘鸿’字应改为‘红’字才恰当。”

上海大学在“五卅”运动中被英租界工部局查封，陆久之辍学了，共产党员徐梅坤介绍他到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工作。当时，周恩来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来加强对总工会的领导，总工会许多文件都是经他修改后才发布的。从此陆久之在周恩来以及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人领导下工作，受到了这些人的熏陶和教育，思想觉悟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整天刻蜡纸，搞油印，分发文件，还要接待来访的工人，忙得汗流浃背，喘不过气来。但是，他却不以为苦。

1927年冬，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候，“老板”蔡叔厚由陈德辉、汪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非常庄重地对组织说：“看到革命者一天天地牺牲，一天天地减少，我觉得有责任补上这个斗争的岗位。”不久，陆久之即由蔡叔厚引荐当上了周恩来地下信使的联络人。从此，绍敦电机公司变成了一座红色的战斗堡垒。党中央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交通联络站。党的文化部也设在这里。冯雪峰、夏衍、陈德辉和蔡叔厚都在这个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在党的领导下，蔡叔厚、陆久之参加了各种革命斗争，许多同志把绍敦电机公司称作“救难会”，因它经常是遇难同志落脚和寻找党组织的地方。1927年底，公司先后接待安排了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到上海来找组织的叶剑英、邢西萍、廖承志、李求实、匡亚明、张去非等几十位同志。“蔡老板”几乎把全部的营业收入都用来安

排大家的食宿，走时还尽可能给他们带上一点路费。

这时，国民党在上海利用流氓头子陈群、杨虎等人，成立了一个“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并指派杀人不眨眼的青红帮头子常玉清担任调查组长。这个调查组实际是一个特务组织，他们像一群狼犬，到处搜查革命者，对革命组织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于是，党组织安排陆久之打入这个组织，成为地下党在调查组的内线。由于他整天跟这帮特务、鹰犬一起东跑西颠，不明真相的同志，对他怒目而视，有人甚至主张将这位出身官僚家庭的大少爷清除出革命队伍。陆久之在自己同志的蔑视下忍辱负重地为党秘密工作着，为保护和营救革命同志作出了特殊贡献……

一天，“工统会调查组”一名密探报告：中共要员陈赓经常出现在新闸路某条里弄。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暗杀组。但是，特务们守了几天，却不见陈赓的半点踪影。还有一次，一名特务发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后被捕叛变）隐藏的地点，但等到搜捕人员赶到时，向忠发早已人去楼空。

原来，陆久之在得到特务行动的情报后，立即通过周恩来的秘密信使，以最快的速度向自己的同志发出了警告。

“工统会调查组”在多次发现追捕行动失败后，知道自己内部不纯，他们对陆久之产生了怀疑，但又一时找不到证据，只好将其解雇，并加以秘密监视。

陆久之得知突然被解雇的消息后，立即离沪到广州避难。同船到广州的有叶剑英的老部下李国谌。他们到达广州后，一起借住在大埔叶剑英的家里。当时，叶家中除叶母及曾宪植外，还有医务工作者柯麟寄宿。在叶家大家经过研究，认为陆久之有官僚家庭作背景，敌人是轻易不会下手的。因此，策划由连声海（曾任孙中山秘书长）出面写介绍信给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请他帮助安排陆久之的工作。就这样，陆久之又回到了上海，当上了招商局的秘书兼《航业半月刊》编辑主任。陆久之奉命利用工作之便，

组织招商局海员工会，并酝酿发动罢工。

长期以来，陆久之以一个出身显赫的文弱书生的身份，混迹在上流社会中，整天打交道的不是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便是沉湎于灯红酒绿的舞场中的纨绔子弟。虽然为党作了大量工作，但他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很不安心。一次，他向上海地下党的陈寿昌说：“我要入党，要到战场上去接受党的考验！现在这样的生活，会把我烂掉的！”

不久，陈寿昌通知他：“你的想法我已报告组织，伍豪同志表示十分理解。他让我转告你：欢迎你入党，但是，你暂时不参加党，可以为党做更多更重要的工作！”

陆久之听罢顿觉眼前一亮：“是啊，党把许许多多最机密、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说明这一阵地十分重要、不可缺少。我没有理由不安心眼前的工作！”于是，他对陈寿昌说：“请转告伍豪同志，我决心听从党的指示，在敌人的心脏中长期战斗下去！”

1929年6月，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从苏联开会回国，途经上海，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于是周恩来派陈寿昌告诉陆久之，要他做好掩护佐野学的工作。这位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便冒充为陆久之的日文教师，在陆久之处整整住了35天，后由党组织派人接走。佐野学在离开陆久之后10天，不幸在上海闸北被国民党特务抓获。

由于组织海员罢工失败和藏匿佐野学一事被泄漏，陆久之被迫于1930年初仓促出亡日本。在亡命日本期间，他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读研究生，又在铁道学校业务科取得毕业证书，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在此期间，他仍然同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

1932年，夏衍由上海专程到东京看望陆久之，告诉他：“过一段时间之后，叔厚要来东京看你。”夏衍察看了他的居住环境，告诉他房子小了点儿，嘱咐他租一处大一些的房子，环境要幽静些，四

周最好不要有什么邻居，租房的费用没有问题。陆久之知道组织上又有任务交给自己，便认真照办。

两个月后，蔡叔厚来到东京，向陆久之传达了党的指示：“久之，组织上让我通知你，由你负责东京情报站的工作。”

陆久之听了，心中忐忑不安，因为此前，他还没有独立负责过一次工作。他有些胆怯地说：“老蔡同志，我是一个学生，这件事责任太大，我怕担当不起……”

蔡叔厚拍着陆久之的肩膀说：“我的好兄弟，你说，大的事情，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能干，谁还能干？”

在蔡叔厚的鼓励下，陆久之鼓起勇气，接受了组织交给的任务。此后，蔡叔厚根据上级指示，又先后介绍吴选青、王莹及沙文汉、陈修良夫妇等来日本，协助陆久之工作。并安排萧项平（萧炳宝）专门负责与上级联络、传送情报和传达上级指示。当时，他们通过日本共产党，取得了日军参谋本部千分之一的精密地图，了解到了日本的隧道、涵洞、港湾设备及日本政治派系、军事阵营等重要资料，特别是有关日军积极扩军备战的情况，对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狼子野心提供了有力的根据，使党中央早有思想准备。为此，上级党组织对他们的工作曾多次给予表扬。

1933年初，陆久之由日本回到已阔别3年的上海后，他继续利用其身世混迹于当时的上流社会，为党做秘密的工作。

凭借各种关系，陆久之于1936年和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大使许世英攀上了交情，在驻日大使馆当上了高级官员，而实际上仍在为党收集日本军国主义的各种情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久之随许世英回到了武汉。许世英被蒋介石委任为全国赈济委员会主任，陆久之则成为该会的委员。由于这是一个闲职，搞不到多少对党有用的情报，陆久之不感兴趣。不久，听说蒋介石的一个亲信要办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还要派人到沦陷区去搜集情报，他便积极活动，最后终于“中标”。这样，

他又来到了日伪统治下的大上海，继续其“冒险家”的生涯。

到上海后陆久之利用其留学日本的经历和与日本军人的特殊关系，打入了日本海军部，出任日军控制的《华美晨报》社社长，后来，他又伙同几名日本海军高级官员开办了“海安信托公司”，并自任经理。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日本人控制了一切，对从上海去苏北、胶东等解放区的船只进行最严密的监控，但陆久之利用日本海军部发给的通行证，源源不断地派船将各种急需物资运出吴淞口，冒险送往苏北解放区。

一个由重庆政府派来的秘密专员，公开身份又是和日本海军部有特殊关系的报社社长和公司经理，而实际上却在为中共地下党做事。他的一举一动需要做多么精细的安排啊！

华灯初上，坐落在上海延安东路的浦东大楼，在日伪时期是著名的“璇宫舞厅”，它吸引着大批留恋在孤岛上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里，红男绿女翩翩起舞，年轻漂亮的歌女，嗲声嗲气地唱着靡靡之音。陆久之是这里的后台老板，他每天晚上到这里来和舞女们卿卿我我，还和汪伪人员、日本军官、工商巨子等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就在这风流场所，他收集了党需要的大量情报。

黄埔江边汇山码头，一个仓库管理员每天为他收集日本军舰调动的资料。他记录下有多少日军新调来上海，又记录下有多少船只运骨灰盒离开码头。

和汪精卫同时投日的高宗武、陶希贤又背叛汪精卫秘密逃往香港了。陆久之立即把消息告诉国民党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负责人，但又把详细的副本交给了当时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刘少文。

.....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巧妙的伪装，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破绽。利用船只运物资给新四军一事终被日本宪兵察觉。一天，日本特务逮捕了陆久之。把他关进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地下室里严刑

拷打，要他交待和共产党的关系。但陆久之只说“我是商人，不问政治”，始终否认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他的坚硬不屈，满口流利的日语和不凡的谈吐，引起了一个日本看守的同情，他表示愿意给陆久之提供帮助。陆久之当即写了一个便条，托这个看守交给平日有交往的日本朋友、海军武官古川时太郎。由于古川时太郎的营救，陆久之终于得以脱离魔窟。

“总统快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日伪时期耀武扬威鱼肉百姓的达官贵人们顿时成了过街老鼠。除少数与重庆国民党政府暗中有勾结者外，大多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有本事的，远走高飞，逃之夭夭；无能耐者，偃旗息鼓，隐身地下。……

8月16日，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南京市长周学昌被重庆任命的“国军前进指挥”周嫡带兵逮捕，伪军政部长萧叔萱遭打伤毙命。

8月17日，伪内政部长陈群在家中服毒自尽。

8月25日，继汪精卫之后任伪南京政府主席的陈公博飞往日本，藏身京都金阁寺。随陈一同逃亡的除其妻李厉庄外，还有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何炳贤、实业部长陈君慧、文官长周隆庠等要员。

.....

昔日吃香的达官贵人如今臭似粪土。不少人暗暗为陆久之担心。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这位日伪时期“走红”的《华美晨报》社社长、“海安信托公司”的大经理却是“重庆方面的人”。他摇身一变，竟又成了国民党派驻上海的“接收大员”，还被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委任为“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成为“汤总司令”家

中的常客。汤家的厨师、女佣、汽车司机、机要秘书，都是陆久之推荐介绍的。陆与汤食同桌，出同车；汤微服私访，由陆作陪；汤视察战地防御工事，由陆当随员。汤恩伯还委派他担任日文《改造日报》社社长。他成为汤身边不可缺少的心腹和智囊人物。

汤恩伯何以对陆久之信任有加？原来，他们并非一见如故，而是名副其实的世交。

汤恩伯，浙江武义县人，原名克勤，是蒋介石倚重的“五虎上将”之一。1922年曾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主修法律，由于他对学法律缺少兴趣，便想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但一少资金，二无门路。正在作难之际，陆久之的父亲陆翰托人保荐了他，使之如愿以偿。陆翰所托之人乃是当时的浙军第一师师长的陈仪。汤奉陈仪为恩师，敬若神明，改名为“恩伯”。表示对师恩永志不忘。1927年夏，汤恩伯学成回国，任陈仪的参谋长。1928年，汤恩伯调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任第六期学生总队大队长。在此期间，颇受蒋介石的赏识，被蒋越级提拔为第二师师长。1933年，又调入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红军，并升任纵队司令兼第四师师长。从此，他一帆风顺，由第十三军军长升任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成为一个拥有庞大实力的军阀，继陈诚、胡宗南之后，成为国民党军界的风云人物。日本投降后，汤恩伯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由于汤恩伯念念不忘陆翰推荐之恩，因此一直视陆久之如同兄弟。另外，随着手中权势的增加，汤恩伯做官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开始做当副总统的美梦，他见陆久之才学出众，思维敏捷，谈吐风趣，出口成章，且胆识过人，见解独到，是能帮助自己登上副总统宝座的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把陆久之当作智囊，让其时刻不离左右，帮助出谋划策。

陆久之倍受汤恩伯信任的另一原因是，他巧妙地收买了这位司令官的心腹，让他们在汤司令面前为自己说好话。例如，为汤恩